

戰後「臺灣文學史」的建構及其內涵探析

林中力*

摘要

「臺灣文學史」是臺灣文學作為一門知識領域所賴以立足的基礎，它不僅為臺灣文學劃定輪廓、追溯發展的軌跡，同時也提供其作為展望未來的實質內容。然而，儘管「臺灣文學史」已在臺灣文學的研究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臺灣文學史」該如何建構，要怎樣來書寫，甚至該如何被看待等等，卻是依舊充滿歧異而未有定見。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與「文學史」作為一種特殊文類的本身相關，再者則是與「臺灣」概念的複雜性無法切割。因此，本文擬從文學史的基本探問出發，觀察臺灣文學史在建構上所面對的難題，並對臺灣文學史書寫一路走來的足跡進行歷史性的探勘。也即觀察臺灣文學史的概念與內涵究竟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怎樣的呼應或對抗？其間的臺灣文學史又是以怎樣的方式被建構？這對後來的文學史書寫又是有著怎樣的影響或效應？透過這些探索，本文期能對於臺灣文學史書寫的既定看法有所更新，進而提供嶄新詮釋的可能性。

關鍵詞：臺灣文學史、臺灣文學、抗日、中國化、臺灣意識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Exam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and its Meanings in the Postwar Period

Lin, Nikk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is the first step in learning about Taiwanese literature. It not only defines the category 'Taiwa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gives a means for tracing Taiwanese literature's historical origins and directing its future course. Although literary history is undeniably vital in studying Taiwanese literature, there is significant disagreement on how such history should be built, written, and critically evaluated. This is due to internal debates over the genre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complex entanglements that anyone attempting to interpret "Taiwan" must handle. Thus, this study begins with an overview of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themes in literary history, then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of constructing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ies before giving a historiographical analysis of the courses and forms of such endeavors. During the proce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ill be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What socio-cultural developments influenced the writing of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ies? How are these literary histories constructed at a textual level? How did literary history from the past influence those from later and present times? By addressing these subjects, this study seeks to update some of the more calcified ideas of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make space for fresh and alternative readings.

Keywords: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Taiwan Literature, Counter-Japanese, Sinicization,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戰後「臺灣文學史」的建構及其內涵探析

林中力

一、「臺灣文學史」的建構難題

「臺灣文學史」已隨「臺灣文學」成為一門知識領域而進入學術的體制，它是對臺灣的文學發展進行歷史性的回溯，也是思索「臺灣文學」作為專門知識領域的定義、範圍、輪廓甚至是存在意義究竟為何的自我追尋。就此而言，「臺灣文學史」既是「臺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所賴以立足的基礎，同時也是它形塑自我認同以及想像未來的重要路徑。然而，儘管「臺灣文學史」已在臺灣文學研究當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臺灣文學史」該如何建構，要怎樣來書寫，甚至該如何被看待等等，卻仍充滿歧異而難有定見。

臺灣文學史在建構上的難題，首先是與「文學史」作為一種特殊文類的本身相關。一般而言，文學史之所以能夠成立，必先預設某個統一「實體」(entity)的存在。¹ 例如具有實體邊界的地方、有連續文化傳承的民族和語言、相同的階級或性別，以及可以被指認的文類或風格等等。儘管文學史的形態各異，但最廣為所熟知的，則是以一國或一民族為範圍的「全稱式」的文學史，例如「英國文學史」、「日本文學史」或「中國文學史」等等，都是屬於這個範疇。這種全稱式的文學史，乃是隨現代民族國家紛立的 19 世紀而興起。文學被視為一國或一民族的精神展現，因此，文學史所捕捉的，往往是一國或一民族文化共同體的重要紀錄。

現今在大學的課程當中，英國文學史、日本文學史或中國文學史，都是理所當然的學術科目。然而，如果全稱式的文學史所捕捉的是一國或一民族的文學發展過

¹ David Perkins,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2.

程，那麼，「臺灣文學史」該如何處理？關於這個問題，若從「國家」的角度來看，臺灣在戰前與戰後分屬兩個不同的國家，因此，它在戰前是日本文學的一部分，但是到了戰後，則是搖身一變成為中國（中華民國）的文學；或者，若是以「語言」作為文學史的根據，也會有多語紛雜而難以統一歸類的尷尬；而從「民族」的視野來看，一樣也很難將「在臺灣的人」納入某一個民族，甚至目前對於「臺灣民族」是否存在，也似乎還有待共識的凝聚。最後，若是從「地方」的角度來詮釋，那麼，同樣也可能會落入所謂「在臺灣的日本文學」或「在臺灣的中國文學」等莫衷一是的問題。

也因此，「臺灣文學史」的建構向來都不是一件輪廓清楚、內涵明確的工作。學者蕭阿勤曾經在論文〈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中觸及到這個問題。他在文中首要的疑問是：「本土化典範為何在文學領域引起遠較其他領域嚴重而持續的爭論衝突，以及為何文學領域中的這個議題和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關係遠比其他領域更為密切。」²蕭阿勤在文中所討論的「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指的並非臺灣文學的作品，而是關於臺灣文學的歷史敘事，也就是臺灣文學史的本身。也因此，儘管「臺灣文學史」並非蕭阿勤在文中的主要論題，但它以臺灣文學史的書寫為觀察文本，並從文學史的敘事探究其間的認同政治。就此而言，蕭阿勤在論文中所提出的質問，關係到的其實也正是臺灣文學史在建構上的難題，值得作為本文參照的出發點。

論文中蕭阿勤首先指出：「在文學領域成為長久爭議焦點的那種本土化典範，通常涉及一種歷史敘事，亦即從特定的主體觀點出發，以清楚的開頭、中間、結尾的次序來安排事件的一種『情節化』的論述形式。」³而這些正是「敘事」的重要特徵。也就是對於事件依時間序列而作有開頭、中間與結尾的安排，並且透過情節的賦予，使之具有意義與方向性。而敘事也必須將歷史事件置於脈絡之中，讓它們與其他事件在空間與時間的關係中發生關聯。而敘事往往也是個人建構認同的基礎，這些依

² 蕭阿勤：〈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文化研究》1（2005.9），頁99。

³ 蕭阿勤：〈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頁100。

循著某些時間順序與因果關聯所展開的敘事，也是人們了解自己以及自身所在位置的重要憑藉。蕭阿勤透過敘事學理論來觀察臺灣文學史的論述，並且進一步提出，在臺灣文學本土化典範的爭論中，「爭論的雙方都依賴一個涵蓋臺灣人集體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敘事模式來回答這個問題，並提出主張。」⁴而這種牽涉認同的敘事，則必須借助「意義封閉」來建構認同。也就是說，敘事的整體意義形構排除了對事件或經驗的不同詮釋，同時也阻止了意義的開展，而這正是「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容易帶來衝突的原因之一。⁵

循此立論，蕭阿勤在論文中考察了葉石濤等本土論者在 1960 到 1970 年代之間的論述，指出其「關於臺灣鄉土文學的集體記憶建構的基本參考架構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也就是把臺灣文學放進「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模式之中，視為其情節的一部份，進而尋找它們在這個整體經驗的關係結構中一個適當位置。」⁶而這種以歷史化或敘事化的取向提出對臺灣文學的認識，基本上確立了當時至今文學領域中談論本土化典範的方式。而直到美麗島事件之後，才催發了前述的本土論者反國民黨的政治意識與文化活動。而蕭阿勤進一步指出，1980 年代以來，這種從「去中國化」到「(臺灣)民族化」的歷史敘事模式發展過程中所建構的臺灣認同，明顯地具有「後殖民的本質主義」特徵。⁷而這種本質主義的動員無論是「策略性」與否，都難以逆轉，而最終製造成激烈衝突，甚至召喚「國家暴力」。

然而，就文學史建構的角度來看，前述蕭阿勤所謂造成爭論衝突原因的「意義封閉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實正是文學史得以成立所必須仰賴的大前提。也即，文學史的建構首先必須預設一個存在的「統一實體」。在這個統一的實體當中，它的輪廓必須越清楚越好，因此，必須要有可以連結過去與現在的具有意義的時間、一群擁有共同歷史經驗的人、以及他們在這個連貫的時間中對於時代所作出的回應。不僅如此，這所謂的「意義封閉」的認同敘事，則又與文學之所以能夠成史的另一個

4 蕭阿勤：〈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頁 105。

5 蕭阿勤：〈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頁 113。

6 蕭阿勤：〈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頁 107。

7 蕭阿勤：〈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頁 114。

重要前提——也就是「文學」與「歷史」之間的關係究竟該如何處理——的問題密切相關。也即，文學史的建構，除了前述的「人」與「時間」等要素之外，文學的作品與事件也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然而，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作品與作品之間、或各個文學事件彼此之間的因果關係毋寧是相當薄弱的，並且，文學在不同的時代裡也未必有「進化」的軌跡可循。誠如姚斯與班齊格（Hans Robert Jauss and Elizabeth Benzinger）所說，與歷史中的政治事件有所不同的是，文學事件並不會對後世產生無可避免的持久性結果，而是，只有當後人持續地對過去的文學事件作出反應或重新發現它時，文學事件才有可能對後世產生影響。⁸也因此，根據文學事件所建構的歷史，總是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當代讀者、評論家和作者的史觀詮釋與美學判斷。如此一來，文學史更是必須借助敘事與情節化，才能夠把原本互不相干的文學作品與文學事件的片段連結在一起，並賦予它們一個具有統一性的「整體」。而這種以一國或一民族為主體的「全稱式」的文學史，基本上就是假設了其所指涉的國家或民族是一個完整的「實體」，並且往往必須依附在國家或民族的歷史敘事之中才能被描述。

文學史在建構上所必須仰賴的大前提，從蕭阿勤以敘事學的角度觀之，便不免落入「意義封閉」、「本質主義」並且與「國家暴力」難脫關係。然而，本文認為，文學史的成立畢竟有其自身的脈絡，儘管它可以做為認同敘事的研究材料，但若真正了解「文學領域中的本土化典範」之「衝突」所在，恐怕還是有必要進入文學史如何作為一門知識領域的形成過程中，才能提出更為有效的解釋。不僅如此，蕭阿勤所提出的認同爭論，也與臺灣文學史在建構上的難題息息相關。因此本文擬以此為問題意識的出發點，而將臺灣文學史的觀察往前回溯，並從歷史的縱深來瞭解其難題到底源自何處？以及，究竟是甚麼樣的時代條件使得文學史撰述者作出怎樣的回應？而文學史的建構在與當下情勢的共構中，又是呈現出怎樣的縫隙與樣貌？有關於此，由於戰前的文學史建構研究已有相關的成果，在此僅以相對較少的篇幅勾勒其輪廓，且將考察的重點聚焦在戰後而至第一本以臺灣為主體說寫的臺灣文學

⁸ Hans Robert Jauss and Elizabeth Benzinger,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2.1, A Symposium on Literary History (Autumn, 1970), p. 11.

史——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為止的建構過程。

二、日治時期的文學史書寫

日治時期第一位將文學史視為專門的知識領域、並且嘗試透過有系統的方法論來建構臺灣文學歷史的人，是當時任教於臺北帝國大學的英美文學者島田謹二。⁹他在 1938 年的〈南島文學志〉一文中，針對「臺灣文學是否可以成為一個學術研究的對象」展開辯證。他在文章一開始便拋出關於定義的根本問題：「所謂『臺灣文學』，應該以甚麼觀點去解釋呢？若根據現代學界的共識，所謂一國文學，是必須建立在擁有連續一貫的傳統的語言與國民之上的」。¹⁰島田謹二指的「一國文學」也就是諸如日本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等等全稱式的文學。但顯然，當時作為殖民地的臺灣，既無統合的國民（民族），亦無一脈相承的語言與文字。因此，島田接著說道：「無疑的，『臺灣文學』此一現象並不屬於這個偉大的範圍之內。」¹¹儘管如此，島田並沒有因此而打住，他進一步演繹：「但若是站在現今學術界所使用的『國民文學』的觀點來看，（按：所謂臺灣文學）當然是包括了可以分割成好幾個國家的文學現象的內容。」¹²也就是說，「臺灣」儘管不是一個國家，但，它既然是一塊在歷史上包含了不同國民（民族）的「土地」，那麼，所謂「臺灣文學」應該可以定義為包含了多國或多民族的文學。於是，在如此的觀點與架構下，島田謹二展開了他「恢弘」的歷史視野，而將臺灣原住民、曾經分別占領臺灣北部與南部的西班牙人及荷蘭人、

⁹ 儘管在島田謹二的〈南島文學志〉之前，已有不少相關的文學史建構企圖，但多為報導性質的文章。而島田謹二因其文學研究者的學術背景，因此得以對臺灣的文學史進行較具理論與方法的建構。相關研究請參考林中力：〈殖民地的文學史建構：重探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書寫〉，《臺灣史研究》23：4（2016.12），頁 81-122。

¹⁰ 〔日〕松風子（島田謹二）：〈南島文學志〉，收入〔日〕中島利郎等編：《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文藝評論集》第 3 卷（東京：綠蔭書房，2001），頁 155。

¹¹ 〔日〕松風子：〈南島文學志〉，收入《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文藝評論集》第 3 卷，頁 155。

¹² 〔日〕松風子：〈南島文學志〉，收入《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文藝評論集》第 3 卷，頁 155。

中日混血的鄭成功、清領時期的漢人、隨帝國崛起的海上冒險過程中與臺灣有所接觸的法國人與英國人，以及改隸之後的日本人等等——無論是殖民者或被殖民者的文學——全都納入「臺灣文學」的範圍之中。

〈南島文學志〉是島田謹二探索臺灣文學史的第一步，而後與臺北帝大東洋學講座教授神田喜一郎合著的〈關於在臺灣的文學〉則是有了更進一步的擴充。¹³儘管島田後來將文學的觀察聚焦於在臺灣的日本作家，並且以「外地文學」取代原先對於「臺灣文學」的關注。然而，他所設想的文學史方法，基本上還是圍繞著前述的架構來開展，而這也成為他日後作為日本比較文學奠基者的重要基礎。¹⁴但更重要的是，島田的文學史書寫在相當的程度上也啟發（同時也是刺激）了黃得時的文學史寫作。黃得時在建構臺灣文學史時，沿用了泰納（Hippolyte Taine）將「種族」、「環境」與「時代」視為推動文學的三大動力，並且，特別是在「種族」的部分也強調了臺灣在族群上的多樣性。此外，黃得時在〈臺灣文學史序說〉中，更試圖為臺灣文學劃出界線、框出定義，而以「作者」與「作品」作為兩大主軸，依「本真性」的程度將臺灣文學依序分成五個範疇。¹⁵在黃得時的架構中，臺灣各民族／族群按理都應納入臺灣的文學史之中，¹⁶而他也確實在文中強調：「領臺以後，只要文學活動是在臺灣進行，不管是原住民或本國人，應該都要列入文學史之中。」¹⁷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島田謹二與黃得時都宣稱所謂的「臺灣（的）文學史」應

¹³ 〔日〕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台湾に於ける文学について〉，《愛書》14（1941.5），頁3-24。

¹⁴ 島田謹二在戰後回到日本，擔任東京大學甫成立的比較文學專修課程，也培育了諸如平川祐弘、芳賀徹、小堀桂一郎、龜井俊介等在比較文學領域中的優秀人才。參考〔日〕橋本恭子：《華麗島文學志》とその時代：比較文学者島田謹二の台湾体験（東京：三元社，2012）。

¹⁵ 黃得時在〈臺灣文學史序說〉中將臺灣文學的範圍分為以下五種情形：「一、作者是臺灣出身，其文學活動亦在臺灣者；二、作者為臺灣以外之地出身，但於臺灣長久居住，亦於臺灣進行文學活動者；三、作者為臺灣以外之地出身，但在臺灣進行一段時間的文學活動，之後離開臺灣者；四、作者為臺灣出身，而其文學活動是在臺灣以外之地者；五、作者非臺灣出身，亦從未到過臺灣，亦不在臺灣從事文學活動，但書寫與臺灣相關的作品者。」參考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收入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4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230。

¹⁶ 黃得時在〈臺灣文學史序說〉中提到：「關於短歌與俳句運動、以及描寫臺灣的西歐人文學，請參照島田謹二發表於《愛書》與《臺灣時報》上的諸篇論述。」由此可見，在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圖像中，應該也是包括了日本人以及西歐人。

¹⁷ 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收入《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4冊，頁230。

當包含臺灣各民族的文學，但在實際的操作上，卻不免受制於語言的限制與民族的定見（偏見），而僅能寫出部分的文學史。如島田謹二對於漢人的文學不僅著墨甚少，並且透過文學批評的機制而予以較低的評價；相反的，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則主要是處理漢人的文學，而並沒有顧及於其他族群。雖然目前學界傾向於認為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是為了要與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相抗衡，但實際上，若將臺灣的多元族群實態考量在內的話，島田謹二與黃得時其實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寫出他們所屬的族群的文學史。一個典型的例子可見於《愛書》第十四輯的「臺灣文藝書誌號」。《愛書》是集結了臺北帝國大學與總督府圖書館豐沛的資源、並且由西川滿所主編的刊物，在《愛書》第十四輯中分成兩大部分，前半部分是神田喜一郎與西川滿所共著的〈關於臺灣的文學〉；後半則是黃得時與池田敏雄合寫的〈關於臺灣的文學書目〉（台湾に於ける文学書目），當中收錄了從康熙時代以來與臺灣相關的包括漢人與日本人的文藝書籍與雜誌。這一份書目的編者是黃得時與池田敏雄，並由神田喜一郎與島田謹二進行初稿補定，最後再由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市村榮與劉金狗進行校正。因此，這是一份由臺灣漢人與日本人所共同合作完成的書目。可以說，這《愛書》第十四輯正是很好的體現了戰前臺灣文學史在「理想中」的樣貌，不僅收錄了不同族群的文學作品，撰寫者也包含了臺灣人與日本人。¹⁸

要言之，戰前的文學史書寫可以說是在既對抗而又互補的關係中來進行。如此的狀態，其實正也很好地向我們展示了徘徊在文學史書寫的理想與實際之間的各種難題。

三、戰後的臺灣文學史建構

（一）戰後初期的臺灣文學史書寫

透過如上的整理可以得知，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已是固定沿用的名詞，並且

¹⁸ 參《愛書》14（1941.5）。

對於「臺灣文學史」也試圖進行了有系統的整理，而多元民族的共構，基本上是文學史的型態。然而，如此的文學概念到了戰後，則因政權的轉移而有了很大的改變，且語言的轉換與社會的動盪也對文學表達產生直接的影響。尤其在「回歸祖國」之後，文學史之中的「民族」如何被看待？臺灣文學的歷史應該如何被闡述？文學的評價與定位要如何判斷？這些問題都被迫以不同的角度重新提出討論，而「臺灣文學」的概念也在反覆的論辯過程中被重新塑造。其中最明顯的變化，便是加重了民族主義的色彩，並且以「抗日」與「中國化」作為詮釋臺灣文學史發展的主軸。

戰後臺灣文學歷史的建構，最早是 1947 年王白淵為《臺灣年鑑》所撰寫的〈文化〉篇。¹⁹〈文化〉的內容主要闡述日治時期有關文學、新聞、美術、音樂、演劇與電影等方面的歷史，「文學」則是作為〈文化〉的第一節而共佔了 7 頁的篇幅，主要內容是關於新文學的發展歷史。在王白淵的文學史架構中，主要是將臺灣新文學的歷史分為兩期：前期為白話文文學，後期是日文文學。有關白話文文學的部分，王白淵強調了中國新文學對臺灣的影響。因此，他的文學歷史敘述便是循著《臺灣青年》、《臺灣》與《臺灣民報》等刊物作為開展的線索，並由黃呈聰、黃朝琴以及許秀湖對於中國白話文的引介與論述開始看起。循此脈絡而下，則是將張我軍、賴和、楊雲萍視為臺灣新文學實踐的先驅。此外，除了新舊文學論戰，王白淵亦花費了相當的篇幅闡述 1930 年代的文學，從《洪水報》、《伍人報》、《南音》到《臺灣戰線》等等重要報刊皆有述及。並且，或許緣於王白淵自身曾經是《福爾摩沙》的成員，因而對於「臺灣藝術研究會」的始末與活動有著相當詳盡且較多篇幅的描述。此外，也對「臺灣文藝聯盟」的集結、《臺灣新文學》的出刊，以及 1940 年代之後的《文藝臺灣》與《臺灣文學》進行全面性的介紹。文章的最後，則是以 1943 年 11 月的「臺灣決戰文學會議」作為日治臺灣文學史的休止符。

¹⁹ 《臺灣年鑑》由臺灣新生報社所出版，初稿完成於 1946 年 12 月，但因二二八事件而延遲出版。全書共 936 頁，內容涵蓋臺灣社會、經濟、制度、文化與歷史等等，是戰後初期對於臺灣所進行的最為全面的調查與記錄。其編撰目的，根據〈序〉主要是：「為研究臺灣，建設臺灣參攷所必須。本社為適應省內外人士此種所需要，爰有臺灣年鑑之編撰。」見臺灣新生報社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序〉，《臺灣年鑑》（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47），頁 1。

王白淵的臺灣新文學史書寫，無論架構、起源與發展脈絡都比起戰前的黃得時更加具體而全面。²⁰就此意義而言，王白淵不僅僅是橋接戰前與戰後的文學論者，更是為戰後臺灣新文學史定調的關鍵人物。然而，王白淵究竟如何將戰前的臺灣文學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包括了怎樣的民族構成與時間的安排？而他又是如何評價文學作品的呢？首先，王白淵從開篇即指出：「臺灣的文學，在日本統治時代，比任何藝術部門，總受著更大的壓迫，和歪曲事實的鉗制，在五四運動以後，臺灣就有民族主義文學的產生」，²¹而在提到文學團體時，則強調它們：「均帶著濃厚的民族主義與革命性，而不斷和日本帝國主義，在思想上文學上鬭爭過來的。」²²王白淵在行文中不斷透過五四運動對臺灣的影響，而強調了臺灣新文學與中國的密切關聯。更重要的是，「壓迫」與「抵抗」在這裡被設定為貫串整個日治臺灣新文學發展的共同背景，而臺灣新文學則是被詮釋為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

也因此，王白淵並不以透過日文寫作的謝春木（追風）作為臺灣新文學實踐的開端，²³而是把焦點集中於掀起新舊文學論戰且曾明確表示臺灣文學為「中國文學一支流」的張我軍。將張我軍視為臺灣新文學的起始是戰前所未見，相對的，王白淵對賴和的描述則僅有寥寥數語。只不過在強調民族主義的同時，王白淵還是不忘提起臺灣文學具有「世界文學」的視野，而這張「世界」的入場券，則是透過「日文」作為橋樑。²⁴因此，當他提到 1920 年代的臺灣文學發展時，他如此描述：「已漸由中

²⁰ 日治時期關於漢人的文學史書寫較有規模的文章，最早是劉捷的〈臺灣文學鳥瞰〉（1934 年）與〈續臺灣文學鳥瞰〉（1935 年），而後有黃得時的〈晚近的臺灣文學運動史〉以及包括〈臺灣文學史序說〉（1943 年）在內的〈臺灣文學史〉系列文章。然而，黃得時〈晚近的臺灣文學運動史〉的考察範圍主要是從 1930 年代開始寫起，〈臺灣文學史序說〉涉及新文學的部分僅有一段，而〈臺灣文學史〉系列文章則僅是寫到康熙、雍正時代，便沒有再繼續。關於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史書寫，參見林中力：〈殖民地的文學史建構：重探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書寫〉，頁 81-122。

²¹ 王白淵：〈第十七章 文化〉，收入《臺灣年鑑》，頁 1。

²² 王白淵：〈第十七章 文化〉，收入《臺灣年鑑》，頁 1。

²³ 劉捷在〈臺灣文學鳥瞰〉中爬梳了《新民報》成為日報（1932 年）以來的的新文學軌跡，而續作的〈續臺灣文學鳥瞰〉則是從《臺灣青年》創始之時（1920 年）開始看起，而他所追溯的第一篇小說創作則是追風以日文所發表的〈她往何處去〉。

²⁴ 王白淵：〈第十七章 文化〉，收入《臺灣年鑑》，頁 1。

文轉入日文，更進一步深入大眾，從狹小的民族主義演進到帶著世界性的文學」。²⁵對於「世界文學」的強調，其實也與戰後初期對於臺灣文學重新定位的焦慮息息相關。例如在一場由《新新》所舉辦的座談會中，黃得時曾經道出他的擔憂：「光復後，臺灣雖然極力主張民族文化，但卻因此產生了一種傾向，那就是把以世界文化（水準）為目標的這件事情給忘記了，臺灣在過去，是有其世界性之普遍文化的，而我們千萬不可將之擱置一旁」，²⁶黃得時的看法也獲得了在場的王白淵、張冬芳與蘇新等人的贊同。對於這些從日治時期以來便十分活躍的知識分子來說，令他們感到焦慮的乃是在於，曾經以「世界」水準為志向的臺灣文學企圖，現在面臨「融入祖國」時應該何去何從的問題。

如前所述，文學史敘述必須仰賴超越個體的共同前提才能夠成立。在王白淵的文學史中，除了共同的起源（中國的影響），也包括了可以指認的族群（受日本帝國壓迫的臺灣人民）以及共通的精神（抵抗殖民統治的民族精神），這些都構成文學史作為有機整體的重要元素。只是，這裡所謂的「臺灣文學」，已是純然地指向臺灣漢人的文學，而將日本人或原住民族等等排除在外了。而值得注意的是，將「壓迫」與「抵抗」視為文學史的前進動力，在戰前是不可能存在的。²⁷而臺灣文學「抗日」與「中國化」敘事的出現，斷然與戰後初期的文化困境密切相關。根據陳翠蓮的研究，戰後初期臺灣社會曾經有過自發性的去殖民風潮，對過去的殖民歷史由下而上地展開反省與批判。但與此同時，國民政府的歷史清算卻是以中國民族主義為視角，而將臺灣人在日治時期所接受的「皇民化」與「日本化」一律視為「奴化」，並強行以「中國化」作為掃除殖民遺毒的方法。甚至從 1946 年初開始，所謂歷史清算更是

²⁵ 王白淵：〈第十七章 文化〉，收入《臺灣年鑑》，頁 1。

²⁶ 不著撰人：〈談臺灣文化的前途〉，《新新》7（1946.10），頁 6。

²⁷ 黃得時曾在 1943 年發表的〈臺灣文學史序說〉中提到：「雖有不少吐露這種對於民族與政治上的不平與不滿，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超越民族意識而欣然協力於新統治者的作品，也是佔據多數的。」黃得時：〈臺灣文學史敘說〉，頁 232。而《福爾摩沙》中的蘇維熊則說得更加露骨：「我斗膽說出事實——不管受到其他甚麼民族的統治，漢民族以及臺灣人似乎都毫不在乎。他們只期望有個能保障自己一家生命財產的政府，誰是統治者都無所謂。」參考蘇維熊：〈台灣歌謠に對する一試論〉，《フォルモサ》1（1933.6），頁 5。總之，日治時期並不熱中以「抗日」或「抵抗」詮釋臺灣文學，這當然有其被殖民而無法公開言明的政治背景。

上升成為司法追訴與參政權剝奪的層次，陳儀政府對於「漢奸」的追究與「公職追放」的舉措，也給臺灣社會帶來很大的不安。²⁸也因此，公共場域中的政治表態成為必要的作為。而文學史的寫作，顯然也是作為公開言論的一環，而必須以「抗日」與「中國化」作為臺人奴化論的反駁。

以「被壓迫」、「抵抗」與「中國化」的觀點詮釋臺灣文學，在稍後的「橋」副刊論爭中有了更進一步的強化。《新生報》的「橋」副刊成立於1947年8月，主編歌雷以「橋象徵新舊交替，橋象徵從陌生到友誼」為出刊宗旨，試圖彌合二二八事件所留下的傷痕，吸引許多作家與文藝愛好者在此發表他們的評論與創作，是當時能見度相當高的文學平台。儘管「橋」副刊論爭為期不長，²⁹卻很集中地反映了中國與臺灣之間的種種糾結。開啟論爭的文章可以回溯至歐陽明〈臺灣新文學的建設〉，內容主要是藉由回顧臺灣文學的過去而定位現在，並以此作為未來的展望。因此，這篇文章本身便蘊含有文學史書寫的企圖。歐陽明對於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歷史回顧，主要也是強調彼時臺灣文學具有強烈的「抗日」與「中國化」傾向，他提到：「臺灣文學運動與臺灣反日民族解放運動是分不開的。因為反日民族解放鬥爭是適著廣大臺胞的要求，臺灣文學歷史的發展就是由這樣的鬥爭而來的。」³⁰不僅如此，歐陽明也強調了臺灣新文學與中國的連結：「臺灣文學的第二階段，是一個新舊興替的扭轉期，是一個臺灣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同時也受祖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和刺激。」³¹與王白淵一樣，歐陽明透過臺灣新文學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連結，而強化

²⁸ 有關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歷史清算工作，參考陳翠蓮：〈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臺大歷史學報》58 (2016.12)，頁195-248。

²⁹ 若參照歌雷〈「臺灣新文學運動」論文索引〉(《新生報》「橋」副刊，1948年6月25日)來看的話，最早是從1948年3月26日揚風的〈新時代、新課題〉算起，到同年6月25日陳大禹的〈瀨南人先生的誤解〉，論爭期間只有三個月。但若以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臺北：人間出版社，1999)所提供的資料顯示，與臺灣文學相關的討論或許可以往前回溯至1947年11月7日歐陽明的〈臺灣新文學的建設〉，並下推到1949年3月7日吳阿文的〈略論臺灣新文學建設諸問題〉，則有大約一年多的時間。

³⁰ 歐陽明：〈臺灣新文學的建設〉(《新生報》「橋」副刊，1947年11月7日)，收入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33。

³¹ 歐陽明：〈臺灣新文學的建設〉，收入《1947-1949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34。

了臺灣文學與中國的關係，並藉此將臺灣文學的發展置於中國文學的脈絡之中。而歐陽明對於臺灣文學史的描述，更是大量地嵌進民族敘事，並將民族抵抗、反帝反封建以及人民大眾當作是臺灣新文學的核心。

歐陽明的說法也很快地獲得了其他臺籍的代表性作家們的呼應，如楊遠在〈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中提到：「那時候，文學卻曾擔任著民族解放鬥爭的任務的，它在喚醒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上，確實有過一番成就」；³²林曙光也在「橋」副刊發表〈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從文章篇名來看，頗有沿襲島田謹二的意味。³³文章內容雖認為過去的臺灣文學無太大成就，但卻不忘肯定它「是臺灣人民對日本統治的榨取與剝削堅持反抗的表現」；³⁴此外，葉石濤在〈一九四一年以後的臺灣文學〉一文中則是揭舉：「由於過去臺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臺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³⁵從這些相當具有代表性的臺籍作家的論述可以看出，在「橋」副刊論爭中儘管對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評價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將臺灣文學視為「抗日」的產物，並強調其與中國文化的傳承關係。

綜上所述，戰後初期國族的疆界與族群的歸屬重新劃定，「日本殖民」不僅是不堪回首的記憶，甚至威脅到現下生命的存續。也因此，以「被壓迫」、「抵抗」與「中國化」等民族敘事作為文學史書寫的詮釋方式，自此成形。同時，在此一史觀架構下，臺灣文學在戰前既然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分支，那麼，重回祖國懷抱之後，便自然而然地與中國文學合流，而無需保留「臺灣文學」的說法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文學與「世界」的關係也隨著臺灣歸屬的調整而有所變化。戰前在島田

³² 楊遠：〈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新生報》「橋」副刊，1948年3月29日），收入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43。

³³ 島田謹二曾在1941年發表臺灣的文學相關歷史〈臺灣の文學的過現未〉（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於《文藝臺灣》2卷2號之上。

³⁴ 林曙光：〈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新生報》「橋」副刊，1948年4月12日），收入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67。

³⁵ 葉石濤：〈一九四一年以後的臺灣文學〉（《新生報》「橋」副刊，1948年4月16日），收入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73。

謹二的臺灣文學史敘述中，臺灣被放置在海洋的、殖民的觀點下，因此，它的參照系除了來自於中國的漢文化之外，也包括了殖民主日本、以及西方透過海外殖民地的擴張與全球化的足跡所帶來的影響。然而，戰後臺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之後，它的參照系從此便以「中國」為仰望，而不再以「世界」為座標。

（二）1950 與 1960 年代「臺灣」文學史書寫

臺灣文學史的書寫即使到了 1950 與 1960 年代仍然是與戰後初期一樣，多是出自於日治時期曾經參與文學活動的作家們的回顧文章，如王詩琅、廖毓文、葉石濤與黃得時等人。其中，王詩琅是相對較為積極的一位，他有關臺灣文學史的記述早從戰後初期便已開始，相關的文章有：〈臺灣新文學運動史料〉（1947）、〈半世紀來臺灣文學運動〉（1951）、〈臺灣新文學運動與大陸〉（1959）、〈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1964）等諸篇。³⁶甚至在擔任《臺北文物》主編時，王詩琅策劃了兩期的「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但文學主題的這一期後來遭到查禁，無法出刊。不難想見當時有關臺灣文學的歷史回溯，也都還是相當敏感的話題。³⁷但無論如何，王詩琅在這段期間所撰寫的文章，都為記憶已逐漸褪去的戰前臺灣文學留下重要的歷史紀錄。

而王詩琅究竟是採取怎樣的文學史觀呢？1947 年 7 月發表於《新生報》「文藝」副刊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史料〉是王詩琅企圖建構臺灣文學史的第一篇文章，撰文的目的是為了破除「臺灣過去沒有接受『五四』時代新文藝運動的影響，因此臺灣還是一塊『文藝處女地』」³⁸的說法。較特別的是，王詩琅將戰前臺灣文學的歷史發展分為三期，1924-1932 年是「萌芽期」，1932-1936 年為「本格期」，第三個時期是 1937 年漢文欄被禁之後直到日本戰敗的「御用文學時期」。將戰前的臺灣文學分為三期的作法這是第一次出現，後來也被葉石濤在 1978 年的〈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所沿用。³⁹王詩琅這篇寫於戰後初期的文章雖然強調戰前臺灣文學受到五四運動的

³⁶ 王詩琅書寫不少日治時期歷史記憶的相關文章，與文學相關的紀錄多收入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 9：臺灣文學重建的問題》（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

³⁷ 林瑞明：〈兩種臺灣文學史——臺灣 VS. 中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7（2008.10），頁 114。

³⁸ 王詩琅：〈臺灣新文學運動史料〉，收入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 9：臺灣文學重建的問題》，頁 101。

³⁹ 葉石濤在〈臺灣鄉土文學導讀〉中將戰前的文學史分為「搖籃期」、「成熟期」與「戰爭期」，時間上

影響，卻尚未以「抗日」為之定位。但是到了 1964 年所發表的〈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便很清楚地反覆強調：「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是臺灣新文化運動的一部份，而臺灣新文化運動則是當時反日民族運動的一分支隊伍。」⁴⁰在論及臺灣文學的未來展望時則是主張：「循著中國文學的路線，建設臺灣『地方文學』，建設臺灣『鄉土文學』。」⁴¹不難看見，王詩琅對於臺灣文學史的詮釋，到了 1960 年代的時候已定型化為「抗日」與「中國化」兩大主軸，這基本上可以說是延續王白淵以及「橋」副刊所確立下來的基調。並且，在經過了二十年之後，臺灣文學已更進一步被放置在中國文學的大框架底下，而以「地方」與「鄉土」的面目呈現。

同樣在日治時期便已取得作家身分的葉石濤，從 1960 年代中期開始也以評論者的身分積極回溯臺灣文學的歷史。葉石濤在 1965 年發表的〈臺灣的鄉土文學〉，是他開啟文學史建構的起點。相較於 1948 年在〈一九四一年以後的臺灣文學〉中是以「蒼白貧血」批評臺灣文學，1965 年的這一篇文章裡，卻以截然不同的情感與敘述方式呈現。葉石濤於〈臺灣的鄉土文學〉開篇便提到：「我渴望著蒼天賜我這麼一個能力，能夠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作品，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寫成一部鄉土文學史。」⁴²接著，葉石濤提及戰前黃得時對於撰寫臺灣文學史的努力，並特別點出他仿效泰納《英國文學史》中以三大原則——風土、種族、歷史——作為文學史的動力。但葉石濤也指出，黃得時的文學史書寫僅止於舊文學而少了新文學。言下之意，葉石濤的企圖乃是在於承襲黃得時未竟的志業，並期許自己繼續完成更為完整的臺灣新文學史。

然而，〈臺灣的鄉土文學〉的歷史架構並非順著線性時間而下。也即，它既非如其他的文學史撰述一樣是以報紙或刊物作為時間的線索，也不是以文學社團的活動作為發展的軌跡，而是透過個別作家的評述來進行。葉石濤在歷史時間的開展上，僅是大略地將作家分成「戰前派」、「戰中派」與「戰後派」三大類。所謂的「戰前

大抵也是循著 1920 年到 1930 年，1930 年到 1937 年，以及 1937 年到戰爭結束的分期方式。

⁴⁰ 王詩琅：〈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臺灣文藝》3（1964.6），頁 57。

⁴¹ 王詩琅：〈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頁 58。

⁴² 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初發表於《文星》第 97 期（1965.11），後收入《葉石濤作家論集》（高雄：三信出版社，1973），頁 1。

派」，是指活躍於 1920 年代到 1937 年期間的作家，「戰中派」為 1937-1945 年，而「戰後派」則是講述 1945 到 1960 年代的文學史。⁴³

值得注意的是，葉石濤的〈臺灣的鄉土文學〉是第一篇將戰前與戰後串聯起來的臺灣文學史。在這裡，葉石濤進行了一個低調而大膽的嘗試，也就是將日本殖民治下的臺灣文學與中華民國範疇底下的臺灣文學以「臺灣鄉土文學」為名貫串起來統一講述。在這之前的臺灣文學史書寫，多僅止於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而未延伸至「與祖國合流」的戰後。就「全稱式」的以一國或一民族、甚至必須要有統一的語言傳承作為成立要件的文學史書寫而言，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是有其隱藏的激進意義的。也就是說，〈臺灣的鄉土文學〉既包含了日本殖民的歷史，也涵蓋了中華民國的時間，並且，它將文學史的寫作範疇限定於作為地方與族群概念的「臺灣」，而其所描述的文學對象也是集中於「本省籍作家」的活動與作品。換句話說，不包含中國的「臺灣」與不包含中國人的「臺灣人」，是葉石濤為〈臺灣的鄉土文學〉所設下的邊界。當然，這也是為何葉石濤無法直稱以「臺灣文學」而必須加上「鄉土」的字眼——暗指更大範圍如日本或中國底下的「地方」——來淡化將臺灣視為「完整的實體本身」的疑慮。如此的框架，表面上是限縮了文學史的寫作，但實際上是把「臺灣文學」的另一種可能性前景化了。

除了時間框架與構成對象獨創一格之外，關於臺灣新文學的起源，葉石濤也並不特別強調僅來自於五四運動的影響，而是以賴和為臺灣新文學史的開端。他提到：「本省鄉土文學的誕生應當從賴和開始，因為賴和的出現才奠定了現代鄉土文學的基礎。」⁴⁴這與戰後初期以來為了強調臺灣與五四的關係而將張我軍視為新文學的開端有所不同。不僅如此，葉石濤也強調了多元的影響來源，並且將「世界」的視野納了進來。例如，在述及戰前派作家時他提到：「從這一群『戰前派』的作品中，我

⁴³ 葉石濤所謂的戰前派作家包括：賴和、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吳濁流、楊雲萍、王錦江（王詩琅）、黃得時、王白淵、張深切、徐坤泉等；戰中派為：陳火泉、王昶雄、龍瑛宗、葉石濤等；戰後派則有：楊逵、鍾理和、鍾肇政、林鍾隆、鄭清文、林海音、季季、林懷民、文心、張彥勳、魏曉枝、黃娟、鍾鐵民、「笠」詩社等，以及從事臺灣文學翻譯的張冬芳、林曙光、龔書森等人，都是所謂的本省籍作家。

⁴⁴ 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葉石濤作家論集》，頁 2。

們不難發現五四運動以來的祖國文藝思潮的深刻影響，以及日本歐美文學所影響的蛛絲馬跡。」⁴⁵除了將臺灣文學定位為多元影響下的產物之外，葉石濤也不再像〈一九四一年以後的臺灣文學〉那樣將過去的殖民歷史看作是文化的負債，也不再將亞熱帶的風土視為地理上的限制，反而將之作為有待深掘的「個體特殊性」的豐富題材，而這無疑正是他開始尋求所謂「臺灣特殊性」所跨出的重要起步。葉石濤提到：

由於本省過去特殊的歷史背景，亞熱帶颱風圈內的風土，日本人留下來的語言和文化的痕跡，同大陸隔開，在孤立的狀態下所形成的風俗習慣等，並不完全和大陸一樣，生為作家不就是豐富的題材嗎？能發覺這些特質，深掘個體的特殊性，我認為可以給我們中國的文學添加更廣的領域。⁴⁶

戰後初期到葉石濤發表〈臺灣的鄉土文學〉這段期間的臺灣文學史論述，多是致力於消彌臺灣與中國之間的隔閡，縮短彼此的距離。但在 1965 年這個時點上，臺灣特殊的風土、殖民的歷史、孤立狀態下的民情，卻重新被提出來以作為可豐富文學內容的題材。而這些臺灣獨特的元素，不但是構成完整的「個體」的憑藉，同時也是邁向「更大世界」裡去的基礎。也因此葉石濤提到戰後派的作家：「更少畛域的觀念，自然地融化在中國文學裡，更進一步地努力形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環。」⁴⁷在這裡，儘管「中國文學」仍是必須被強調的歸宿，但「世界文學」畢竟是最終的目標。「世界文學」原本就是作為「民族文學」的對照而在戰前便已進入臺灣文學的論述脈絡之中，並且在戰後初期也作為「奴化」的辯護而曾經短暫地出現，但後來臺灣融入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之後便消聲匿跡。而在葉石濤的這篇重要的著作中，卻又再度出現。

葉石濤的〈臺灣的鄉土文學〉對於臺灣新文學的建構，無論是起源的說法、時間的安排、構成的對象、以及美學評價等等，在 1965 年當時的處境底下其實都是頗為另類的。而這也突顯了葉石濤對於臺灣文學史該如何建構的問題有著不同的想像，這種差異，也在後來的文學史書寫中更加明顯地呈現出來。⁴⁸

⁴⁵ 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葉石濤作家論集》，頁 5。

⁴⁶ 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葉石濤作家論集》，頁 12。

⁴⁷ 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葉石濤作家論集》，頁 12。

⁴⁸ 黃得時在〈臺灣文學史序說〉中以極有限的篇幅提及改隸以後的臺灣文學史，並在文章最後提到白

(三) 1970 年代的臺灣文學史書寫

如果說，葉石濤的〈臺灣的鄉土文學〉隱含的是將臺灣視為「統一實體」的大膽嘗試，那麼，從官方角度所建構的臺灣文學史又是如何呢？成書於 1970 年代中期的《中華民國文藝史》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參照。

為了與中國共產黨競爭歷史撰述的正統性，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央文藝工作研討會從 1971 年開始著手編纂《中華民國文藝史》，並於 1975 年正式出版。這部由半官方所撰寫的歷史，無疑是當時主流觀點的代表。《中華民國文藝史》的項目包含文藝思潮與文藝批評、詩歌、散文、小說、音樂、舞蹈、美術、戲劇、電影等，儘管廣義地涵蓋了文藝的各個面向，但文學依舊是當中的要角。而這部文藝史的時間架構，則是名符其實地按照「中華民國」的時間來開展。按〈序〉中的說明，中華民國的文藝發展大致可以分成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開國前後，以民族主義為文藝思潮的主流；第二個時期，是 1920 年代，也即新文學發展的期間；第三個時期是九一八事變（1937 年）到兩岸分治（1949 年）之間，此時「所有的作家，都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一致為抵抗日本軍閥而奮鬥。」⁴⁹第四個時期則是 1949 年後到成書的 1970 年代，這個階段乃是屬於新人文主義的時期。⁵⁰

既然是依循「中華民國」的時間架構，當然就無法將日治時期的臺灣放入到正史之中，而僅僅以「附錄」的形式，將〈臺灣光復前的文藝概況〉與〈大陸淪陷後的文藝概況〉一起收於本書的最後，在一千多頁的篇幅中僅佔 21 頁，算是聊備一格。⁵¹而與正史有所不同的是，〈臺灣光復前的文藝概況〉一開始便為臺灣的民族組成與文化傳承進行定調：「臺灣最大多數的居民，都是來自閩粵兩地。當先民入臺移植，冒險犯難，開荒闢土，創造這新天地的時候，他們所帶來的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⁵²文中並且強調，儘管異族統治令其文化傳承「縱有若干的變化

話文學，而賴和是他所唯一提到的臺灣作家。

⁴⁹ 谷鳳翔：〈序〉，收入中華民國文藝史編纂委員會、尹雪曼總編纂：《中華民國文藝史》（臺北：正中書局，1975），頁 2。

⁵⁰ 谷鳳翔：〈序〉，《中華民國文藝史》，頁 1-4。

⁵¹ 林瑞明：〈兩種臺灣文學史——臺灣 VS. 中國〉，頁 115。

⁵² 尹雪曼總編撰：〈臺灣光復前的文藝概況〉，《中華民國文藝史》，頁 993。

或受損，但其本質則依然如故，屹立無恙，保持中國文化一支流的性格。」⁵³如此的論述方式，也即試圖透過「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而將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串聯而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樣一來，臺灣的文學也就成了中國文學的一支流，因此，「日據時期臺灣的新文學運動，本來就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部份；也是臺灣民族運動的一部份。」⁵⁴

前文所爬梳的王白淵、王詩琅與葉石濤等人的臺灣文學史書寫，畢竟都是相當邊緣的存在，這部《中華民國文藝史》無異才是當時文學史的主流代表。而這也很好地說明了，直到 1970 年代中期，戰前的臺灣歷史敘事都還是難以登上大雅之堂的。儘管如此，作為中華民國文藝史中聊備一格的臺灣文學，卻在 1970 年代的政治、社會與外交動盪中，成為被關注的焦點。1970 年發生釣魚台事件，中華民國在 1971 年退出聯合國之後，緊接著在 1972 年與日本斷交。釣魚台事件源起於美國在歸還沖繩的同時也打算將釣魚台群島一併交給日本，這種大國之間土地的「私相授受」也引起了海內外的學生抗議。他們以民國初年「日本對華二十一條無理要求」為比附，並以「五四愛國運動」自況，這些抗議激化了社會內部的民族主義。再加上中國在 1971 年進入聯合國之後，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外再也難以自居為「正統中國」。在如此尷尬的情況底下，臺灣的知識分子們也開始對自己的身分認同展開探尋。於是，外交挫折再加上自我／國族身分認同的危機，促使眾人開始關注腳下的臺灣，而這進一步也催化了 1970 年代「回歸鄉土」的熱潮。

「回歸鄉土」風潮所及，使得臺灣的文學受到更多的關注。尤其「中日斷交」時所燃起的反日情緒，更使得人們紛紛把眼光望向從戰後以來便被定調為深具「抗日精神」的臺灣文學。一時之間，對於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挖掘，便成了抗議日本的具體行動，進而也成為追尋「自我認同」的重要途徑。

然而，與 1950 以及 1960 年代多是由日治時期文學歷史現場人物現身說法有所不同的是，1970 年代對於文學史的挖掘與撰寫，已開始由戰後世代——也就是從國

⁵³ 尹雪曼總編撰：〈臺灣光復前的文藝概況〉，《中華民國文藝史》，頁 993。

⁵⁴ 尹雪曼總編撰：〈臺灣光復前的文藝概況〉，《中華民國文藝史》，頁 994。

民黨教育體制之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世代來進行。當中，陳少廷是最早投入的一位。陳少廷在 1972 年的《大學雜誌》發表了〈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後來更將之擴充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一書，於 1977 年出版。這是截至當時為止篇幅最長、描寫也最為詳盡的臺灣新文學史著作。然而，它的基本架構以及歷史詮釋又是如何呢？陳少廷在書中一開始便提到：「在日據時代的後半期，臺灣文壇曾發生過轟轟烈烈的新文學運動。這個運動，一方面是受到祖國五四運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作為抗日民族運動的一個支流。」⁵⁵並且在書的最後，特闢一章〈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意義〉來為戰前的臺灣文學進行定調與總結。陳少廷提出七大歷史意義：一、「臺灣新文學運動是直接受到祖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發生的」；二、「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姊妹——臺灣新劇運動也是民國十二年由廈門返臺的留學生所倡導的」；三、臺灣新文學運動與五四運動一樣，也是由語文改革開始，因此，「後起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必然要走五四的路子」；四、「臺灣新文學運動始終跟抗日的民族運動有密切的關係，文學作品也均帶有濃厚的抗日色彩」；五、臺灣與中國一樣，在 30 年代也都有「誤入歧途」的左翼出現；六、臺灣新文學運動的蓬勃發展從 1932 年開始，「臺灣文藝聯盟」領導了臺灣新文學運動，把富於民族意識的臺灣作家與知識分子連結成一個團體，從文學上展開抗日的民族運動；七、「臺灣新文學運動因臺灣光復、重歸祖國懷抱而永遠結束了。」⁵⁶

從陳少廷對於臺灣新文學史的歸納與詮釋，我們看到了一幅與中國新文化運動密不可分的臺灣新文學史圖景。這當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沿襲了戰後初期以來所定調的「抗日」與「中國化」的歷史詮釋方式，其所謂七大歷史意義也都是緊扣著這兩大主題被建構起來的。不難看出，「抗日」與「中國化」一再地被反覆強調了二十年之後，不但早已深入戰後世代年輕人的想法之中，同時也成為詮釋臺灣文學史的典型模式。但這裡必須特別強調的是，在 1970 年代民族主義氣氛正熾的時刻，也正是透過這種「民族敘事」與「中國化」的方式，「臺灣文學」才能夠取得機會重新浮

⁵⁵ 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 1。

⁵⁶ 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頁 162-165。

上檯面，讓社會大眾所認識。

沉寂已久的臺灣文學在中日斷交的時刻裡重新被提起，並且在相當的程度上被視為抗日的民族寓言而受到青睞。而這同時也意味著，此時重新被挖掘並受到矚目的，也往往是那些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有著明顯批判意識的作品。於是，這無形當中也決定了怎樣的作品會被優先關注，並且也影響了文學好壞評價的判斷標準。如前所述，文學史的寫作除了必須具備某種特定的歷史意識之外，還必須兼顧文學批評的方法與視野。而 1970 年代的此時，同樣致力於臺灣文學史探索的戰後世代人物還有林載爵。他在〈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除了對臺灣新文學運動進行回顧之外，進一步也以楊逵與鍾理和作為臺灣文學——進而是所有臺灣人——的兩種典型的代表。林載爵認為，雖然楊逵在作品中著力於刻畫帝國的剝削與政治的迫害，但卻從來都不曾失去他對社會改革的樂觀期待，在他筆下的知識分子總是有著一份剛毅的理想性，是抵抗殖民統治並引起社會變革不可或缺的內在動力。而相對於楊逵，鍾理和所代表的則是「默默承擔的隱忍精神」，鍾理和筆下所塑造的是在無窮苦難中依舊保持剛毅與容忍的民族形象，是絕境求生的悲壯靈魂。於是，林載爵在楊逵的「抗議」與鍾理和的「隱忍」中，找到了臺灣文學的母體及歷史的泉源。⁵⁷從這裡我們也看到一股動向，也即透過文學史的重新詮釋，企圖尋求民族的精神與靈魂，進而作為判斷文學作品好壞的標準。因此，那些較具民族情感或對日本進行批判的作品，也往往有較多的機會受到關注，並被賦予更高的評價。

而 1970 年代臺灣文學史書寫的劃時代事件，則是葉石濤在鄉土論戰期間所發表的〈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1977)。就臺灣文學史建構的後續發展而言，這篇文章的意義十分重大，甚至可以說是「臺灣文學」成為一專門知識領域的起點。早在 1965 年，葉石濤已透露出他欲繼承黃得時文學史的未竟之業。但或許限於資料尚不完備，而採取了以作家為主要的敘述軸線。但在經過了十三年之後的〈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葉石濤不但可以透過更有系統的時間縱軸呈現出文學史各個階段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葉石濤明顯地已經摸索出將那些散亂在歷史之流裡各自未必有所關聯的文

⁵⁷ 林載爵：〈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2：7（1973.12），頁 4-20。

學事件以統一的歷史目的地與意識的論述方法了，而這可以說是葉石濤對於後續的臺灣文學史發展最具影響力的重要論述。為了更加明瞭葉石濤文學史書寫的內部結構的特殊之處，我們必須從以下幾個方向來逐一分析與探討，也即，觀察他如何設想推動歷史的動力、時間的開展、以及足以將歷史之中紛雜的文學作品／作家統一起來的目的意識。

首先要觀察的是，葉石濤據以作為推動臺灣文學前進的歷史動力究竟是甚麼？那個讓抽象而空洞的時間取得統一目的的意識又是甚麼？有關於此，葉石濤有意識地承襲了黃得時引用泰納的三大原則，也即以「種族」、「風土」與「歷史」作為建構臺灣文學的元素，他提到：

因此，當我們回顧臺灣鄉土文學史的時候，我們不得不考慮到它的根源以及特殊的種族、風土、歷史等的多元性因素。毫無疑問，這種多元性因素也給臺灣鄉土文學帶來跟大陸不同的濃烈色彩，樸實的風格、豐富的素材，以及海中島嶼特有的，來自遙遠國土的，像黑潮一樣洶湧地流進來的嶄新異國思潮影響。⁵⁸

在理性與科學逐漸成為顯學的 19 世紀，泰納也試圖以客觀與實證的方式來為文學與藝術建立學理基礎。他認為，無論精神或物質都是可以解釋的，其產生、發展與演變也都有規律可循。因此，泰納在《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1864) 中，將種族 (*la race*)、環境 (*le milieu*) 與時代 (*le moment*) 的交互作用視為推進文學的動力。而泰納的三大原則所著重的，也就是將文學視為集體的產物，並且是受到環境與時代所形塑的民族精神遺產。這種從「民族」與「集體」的角度看待文學史的方法對於新起的民族國家有著相當的吸引力，因此也很快地遠播到東亞。日本早在明治時期，便有《英國文學史》的英譯本在知識圈裡流通。並且，透過日本的中介也很快地傳入中國，諸如周作人等重要的文學者與批評家，也受到泰納三大原則的影響。⁵⁹因此，當葉石濤選擇了泰納的三大法則作為推動文學史的動力時，

⁵⁸ 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讀〉，收入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8），頁 71。

⁵⁹ 參考林中力：〈建構「臺灣」文學——日治時期文學批評對泰納理論的挪用、改寫及其意義〉，《臺大

換句話說，當他選擇以「種族」、「風土」與「歷史」作為臺灣文學史的基本框架時，便已將「臺灣」設想為一個具有民族或種族意義的統一實體了。進一步，葉石濤更是具體地將臺灣人（種族）在臺灣這塊土地上（風土）經過長年的搏鬥（歷史）而凝聚、留下來的精神，命名為「臺灣意識」。並且，正是這「臺灣意識」，催生了臺灣的文學並且賦予臺灣文學的獨特性。葉石濤透過三大原則將「臺灣意識」進行了如下的演繹：

所謂「臺灣意識」——即居住在臺灣的中國人的共通經驗，不外乎是被殖民的、受壓迫的共同經驗；換言之，在臺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以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搏鬥的共通記錄，而絕不是站在統治者意識上所寫出來的，背叛廣大人民意願的任何作品。⁶⁰

首先，「臺灣意識」是由一群「居住在臺灣的中國人」（種族）與「大自然搏鬥、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環境）所凝聚的共通精神（時代精神）。而這種與環境的搏鬥，更還包括「被殖民、被壓迫」時所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集體行動。這種集體的行動進而成為臺灣文學的主軸，並且，反映在文學創作上的，也就是臺灣作家們將這種內化的抗爭精神形鑠於外的過程。不僅如此，葉石濤更將「搏鬥」與「反抗」的經驗集體化、內化甚至是本質化於臺灣作家們的寫作之中。也因此，他強調：「民族的抗爭經驗猶如那遺傳基因，鏤刻在每一個作家的腦細胞裡。左右了他的創造性活動。」⁶¹然而，正是因為把「殖民壓迫」與「抗爭」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因，於是，葉石濤的歷史起點也就必須從外來統治的「荷蘭殖民時代」開始說起，一路而下至「清末到日本領臺的時代」。葉石濤的文學歷史開展，其實與島田謹二將外來殖民勢力作為臺灣歷史的起點呈現一體的兩面性：對島田謹二而言，外來的殖民勢力開啟了臺灣島內的文明進程；對葉石濤來說，殖民統治帶來臺灣人反抗的覺醒與行動，因而有「臺灣意識」的凝聚。

文史哲學報》83（2015.12），頁1-35。

⁶⁰ 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讀〉，收入《鄉土文學討論集》，頁73。

⁶¹ 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讀〉，收入《鄉土文學討論集》，頁77。

不難看見，葉石濤將戰後初期以來的「抗日」與「中國化」進行了轉譯，也就是將「抗日」擴大到對所有殖民者的抵抗。並且，雖然仍是將臺灣人設定為「在臺灣的中國人」，但這樣的一群人已被注入了「臺灣意識」——也即，筆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搏鬥的集體記憶。從文學史建構的角度而言，儘管就字面上是如蕭阿勤所說的「仍是以做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臺灣人在述說文學故事」，⁶²但，葉石濤為臺灣文學史所鋪陳並且注入的內涵，恐怕是更接近於陳映真所謂之「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的議論」。⁶³也就是說，不管自稱中國人或臺灣人，葉石濤建構了臺灣在種族、環境與歷史的交互作用下而產生的「臺灣意識」，並以此作為統合臺灣文學史的依據。

綜觀 1970 年代中、後期，關於臺灣文學史的著述越來越豐富，由原本對歷史的片段論述進展到更有系統的整理。1970 年代前期受到關注的臺灣作家除了楊逵、鍾理和與吳濁流之外，後期還有更多日治時期的作家陸續「出土」，如葉榮鐘、吳新榮、張深切、張文環、葉石濤、吳瀛濤、王詩琅等人，都有著作集的整理與出版。而《日據下臺灣新文學》（共 5 冊，1979 年 3 月）⁶⁴以及《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共 8 冊，1979 年 7 月）⁶⁵則是更完整地呈現了臺灣戰前的文學樣貌。收錄於《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且由林瑞明所編的〈日據時期臺灣小說年表〉，更是第一次對戰前臺灣文學歷史進行了更為完整的編年體式的整理。⁶⁶所有的這些努力，都使得臺灣文學的發展輪廓有了更為清晰而具體的形貌，也讓臺灣文學史獲得了豐富的內容。

（四）1980 年代及其後的臺灣文學史書寫

隨著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推展、臺灣文學史料的陸續出土，臺灣文學史的書寫也

⁶² 蕭阿勤：〈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國家權利〉，頁 108。

⁶³ 陳映真：〈鄉土文學的盲點〉，轉引自蕭阿勤：〈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頁 108。蕭阿勤認為陳映真對於葉石濤「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的議論」的說法可能是過度反應。

⁶⁴ 李南衡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臺北：明潭出版社，1979）。

⁶⁵ 葉石濤、鍾肇政主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9）。

⁶⁶ 林瑞明：《少尉的兩個世界》（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5），頁 297-380。

越趨熱絡。與解嚴同年的 1987 年，葉石濤出版了第一本以「臺灣」為中心視角的臺灣文學史專著《臺灣文學史綱》，這本專著奠定了臺灣文學史今日的樣貌。其基本的概念延續了先前的〈臺灣鄉土文學導論〉的基本架構，但它最大的突破在於從古典時期一路寫到了 1980 年代。大抵說來，葉石濤的文學史書寫基本上還是延續了戰後初期以來的「民族敘事」風格，只不過，他保留了「抵抗」的元素，但是將「中國化」置換為「臺灣化」。並且，葉石濤透過「抵抗」的概念將臺灣視為一個「整體」，他提到：「從日據時代到現在，臺灣知識分子莫不一致渴望，有部完整的臺灣史出現，以記錄在這傷心之地生活的臺灣民眾血跡斑斑的苦難現實，特別是最能反映臺灣民眾心靈的文學，要有一部翔實的紀錄，以保存民族的歷史性內心活動的記憶。」⁶⁷亦即，葉石濤以共同的悲傷歷史與苦難的現實作為串聯臺灣整體的依據，也因此在這樣的脈絡中，能夠如實描繪臺灣苦難的「現實主義」，則是成為了文學的典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文學史綱》的內容其實包含了兩大部分，前半是葉石濤的文學史論述，後半是林瑞明的〈臺灣文學史年表〉，記載從 1652 年（明永曆 6 年）沈光文飄海入臺開始而至 1985 年為止的文學事件。前者共有 179 頁，後者則是佔了 174 頁的篇幅。可以說，《臺灣文學史綱》在同一本書中並置了兩種歷史的書寫方式：一為敘事體，另一則為編年體（以時間為軸線，按年代的順序敘述每年發生的歷史事件），兩者的篇幅相當，各自獨立。⁶⁸《臺灣文學史綱》的年表共分明清、日治與戰後三個部分，分別是依據廖毓文（廖漢臣）的〈臺灣文學年表〉、塚本照和〈台湾文学年表（試稿）——旧日本植民地時代（1895-1945）〉以及文建會所出版的《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上的紀錄而來。但林瑞明也特別提到：「為了節省篇幅，大陸來臺作家之作品，絕大多數未列入。」⁶⁹這其實也意味著，儘管一般認為編年體式的文學史不若敘事體文學史一樣必須要有一個將歷史「情節化」的過程，因此較無牽涉意識形態。但即使如此，史撰者對於史料進行篩選的動作這本身，便已啟動

⁶⁷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頁 2。

⁶⁸ 根據林瑞明自述，〈臺灣文學史年表〉乃是根據收入《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其所撰寫的〈日據時期臺灣小說年表〉所擴充而來。

⁶⁹ 林瑞明：〈臺灣文學史年表〉，收入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頁 182。

個人的價值與審美判斷的主觀性了。但無論如何，如果說，葉石濤對於臺灣文學史提供了論述的基礎，那麼，林瑞明的這份年表則是提供了臺灣文學史確切而實質的內容。兩者對於臺灣文學的形構都有著很大的影響。

而 1991 年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以更犀利的筆觸描寫臺灣新文學從 1920 年代的發軔而至 1980 年代臺灣文學的本土化與多元面向的發展狀況，同時也將原住民族、農民與工人文學等邊緣的聲音，以及女性、環保、母語等等寫進了臺灣文學史之中。而除了臺灣作家與學者所撰寫的臺灣文學史之外，對岸的中國也不遑多讓，其以特定的意識形態強勢地參與了 1980 年代以來全稱式的臺灣文學史書寫熱潮。

然而，這種全稱式的文學史到了 2000 年之後，隨著臺灣文學進入大學的課程而有了相當程度的變化。換句話說，一方面緣於大學課程的需要而亟需一套具有嚴謹學術要求的臺灣文學史，但另一方面也因為臺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日趨細緻與分工，而且在各個領域中也發展出更多不同的理論與方法，因此，「重寫臺灣文學史」遂成為一股新興的動向。例如，單德興就曾提出「臺灣文學史書寫的多元化訴求」，對於過往「中心與邊陲」的關係進行質疑與重新思考。⁷⁰隨之而起的，是以「次領域」面貌出現的文學史——諸如女性、同志、原住民族、在臺馬華文學、母語、區域文學、或以文類為主體的詩歌、散文、小說等等的文學史書寫——的紛然冒現。最具代表性者，諸如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上、下）》（2009），⁷¹區域文學史如廖振富《臺中文學史》（2015），⁷²以族群或語言為主軸而展開的有方耀乾《臺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2012），性別研究方面有紀大偉《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2017），⁷³而當中最大宗當然還有以各種文類（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兒童文學、翻譯等）或以文藝潮流（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作為焦點的文學史寫作。而由

⁷⁰ 單德興：〈洞見與不見：淺談書寫臺灣文學史〉，收入張錦忠、黃錦樹：《重寫臺灣文學史》（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397-402。

⁷¹ 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臺北：里仁書局，2009）。

⁷² 廖振富：《臺中文學史》（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2015）。

⁷³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國立臺灣文學館所出版的「臺灣文學歷史長編」(2013)則是以 33 個不同的主題所出版的 33 本文學史著，而這正是「小文學史／次文類文學史」現象的具體展現。

然而，2000 年之後的臺灣文學史書寫當中，還能夠冠上「臺灣全稱」的文學史，大抵僅有陳芳明在 1999 年陸續載於《聯合文學》而後續整理成書於 2011 年的《臺灣新文學史》了。⁷⁴全稱式的臺灣文學史至此，大抵就沒有繼續再往前推進了。⁷⁵

四、結論

透過前文對於臺灣文學史書寫歷程的回顧可以看到，早在日治時期便已開啟臺灣文學史的建構工程。然而，在以一國或一民族為框架之「全稱式文學史」的書寫當中，「臺灣」因其殖民歷史，而被視為複數民族共同棲居之地。因此，在這個架構下的「臺灣文學史」也被理解為多元族群所共構的歷史。然而，畢竟受限於語言和民族的藩籬與偏見，所謂「臺灣的文學史」，終究只能由撰述者各自寫出與自身族群相關的、部分的文學發展歷史。

而戰後臺灣與「祖國」合流之後，政治歸屬一夕生變，再加上，「臺人奴化論」的偏見甚囂塵上，因此，作為對應時勢的變化與自我辯護的需要，臺灣文學史的建構也被強調以「抗日」與「中國化」的內容，並在「橋」副刊論爭之後，自此定調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的主要特徵。如此的情形一直持續到 1970 年代，緣於「中日斷交」所激起的民族主義熱潮，以及回歸臺灣鄉土現實的需要，臺灣文學也再度

⁷⁴ 2000 年之後還能夠冠上「臺灣全稱」的文學史，除陳芳明的《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之外，還有宋澤萊《臺灣文學三百年》(臺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1)，以及國立臺灣文學館所出版的一系列「臺灣文學歷史長編」(2013)，但，前者與其說是文學史，就內容而言卻是比較接近針對不同時代的特定作家與作品的文學評論；而後者則是由「次領域」文學所構成的系列叢書。

⁷⁵ 儘管全稱式的臺灣文學史不再推出新作，但是將臺灣作家與作品納入「世界華文」或「中國」的文學史仍陸續出版，如馬森《世界華文新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度西潮》(2015)以及王德威《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下)》(2021)都是相當晚近的大部著作。

因其濃厚的「抗日」民族精神而被熱切地擁抱。曾經繫獄 12 年而遭人遺忘的楊逵，從剛出獄時投稿屢被拒絕，到 1970 年代中期而一轉成為年輕世代所朝聖的對象，⁷⁶如此的人生轉折多少也反映出臺灣文學在戰後從被否定、歧視而終於被再發現的坎坷遭遇，這同時也如實地道出從「抗日」與「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詮釋臺灣文學史，是具有多麼強大的符號功能。而以此作為詮釋臺灣文學史的方式，基本上就此定型。甚至後來即使從西方學術界汲取了「後殖民」的理論資源，也大抵還是循著「民族抵抗」的基調而開展。

因此，回應到蕭阿勤〈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所拋出的問題：「本土化典範為何在文學領域引起遠較其他領域嚴重而持續的爭論衝突，以及為何文學領域中的這個議題和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關係遠比其他領域更為密切。」這也正如前文所述，劃定國家或民族的邊界，是全稱式的文學史能夠成立的重要前提。然而，這所謂一國或一民族的文學史所要求的疆界，卻總是與實際的政治邊界以及族群認同有著很大的重疊。也因此，葉石濤曾謂文學史「相關問題的解決，須待直至國家主權地位的確立，才有可能露出曙光的一天」，⁷⁷其中的意涵，未必如蕭阿勤所說的是對國家暴力的呼喚，⁷⁸應該說，對於國家或民族疆界的劃定，原本就內藏於全稱式的文學史裡。因此，蕭阿勤提問的解答，其實正是存在於文學史之所以成立的前提之中。

然而，隨著社會趨向多元，跨國流動現象的頻繁，再加上解構理論的思潮席捲，所謂歷史的本真性、史學的語言轉向等等，在在使得強調主題性、目的性、連貫性以及統一性概念而無所不包的宏大敘事所建構的文學史也受到了挑戰。因此，誠如哈勤（Linda Hutcheon）所言，在後現代的條件下，過去僅著眼於單一國族的敘事所建立起來的文學史模式，在全球化的今日也已經顯得力有未逮。⁷⁹如此的變化也相當

⁷⁶ 林梵：〈楊逵畫像——前言 一個老作家再臨文壇〉，《仙人掌》3（1977.5），頁 235-265。

⁷⁷ 葉石濤：《臺灣文學入門：臺灣文學五十七問》（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頁 45。

⁷⁸ 「對葉石濤與陳映真所代表的雙方而言，文學本土化典範以及與其對抗的典範以國族敘事所達成的意義封閉，只有靠國家權力——如果不是完全的暴力的話——才能得到最終的保障。」蕭阿勤：〈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頁 120。

⁷⁹ Linda Hutcheon, "Interventionist Literary Histories: Nostalgic, Pragmatic, or Utopian?" *Modern*

程度地反映在 2000 年之後的臺灣文學史書寫當中。在後殖民與後現代思潮幾乎同時並行的狀態下，「全稱式」的臺灣文學史書寫還未有進一步的推進之前，「次領域」的文學史則已然百花齊放。這也意味著，臺灣的文學史書寫逐漸從「國族」的大敘事轉向於關注更小單位或更邊緣存在主體的文學史，諸如以性別、族群、地方或文化現象的角度所構成的文學史。就此意義而言，未來所謂的「臺灣文學史」應是猶如星叢（constellation）一般的概念，它是由各種不同主體與視角所共構的集合體。而這些由個別的主體與視角所建構的文學史，透過彼此的參照，形成既競爭卻又相互補足的狀態。也因此，理想的「臺灣文學史」也應是恆常處於建構的進行式之中的。

徵引文獻

近人論著

不著撰人：〈談臺灣文化的前途〉，《新新》7（1946.10），頁6。

中華民國文藝史編纂委員會、尹雪曼總編纂：《中華民國文藝史》，臺北：正中書局，1975。

* 王詩琅：〈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臺灣文藝》3（1964.6），頁49-58。

宋澤萊：《臺灣文學三百年》，臺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1。

李南衡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臺北：明潭出版社，1979。

* 林巾力：〈建構「臺灣」文學——日治時期文學批評對泰納理論的挪用、改寫及其意義〉，《臺大文史哲學報》83（2015.12），頁1-35。

* 林巾力：〈殖民地的文學史建構：重探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書寫〉，《臺灣史研究》23：4（2016.12），頁81-122。

林梵：〈楊逵畫像——前言 一個老作家再臨文壇〉，《仙人掌》3（1977.5），頁235-265。

林瑞明：《少尉的兩個世界》，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5。

林瑞明：〈兩種臺灣文學史——臺灣 VS. 中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7（2008.10），頁107-145。

林載爵：〈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2：7（1973.12），頁4-20。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 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臺北：里仁書局，2009。

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8。

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 9：臺灣文學重建的問題》，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

張錦忠、黃錦樹：《重寫臺灣文學史》，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 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

*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 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臺北：人間出版社，1999。
- * 陳翠蓮：〈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臺大歷史學報》58 (2016.12)，頁 195-248。
-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 葉石濤：《葉石濤作家論集》，高雄：三信出版社，1973。
- 葉石濤、鍾肇政主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9。
- *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
- 葉石濤：《臺灣文學入門：臺灣文學五十七問》，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 廖振富：《臺中文學史》，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2015。
- * 臺灣新生報社叢書編纂委員會編：《臺灣年鑑》，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47。
- * 蕭阿勤：〈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文化研究》1 (2005.9)，頁 97-129。
- 蘇維熊：〈台湾歌謡に対する一試論〉，《フォルモサ》1 (1933.6)，頁 2-15。
- 〔日〕中島利郎等編：《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文藝評論集》，東京：綠蔭書房，2001。
- 〔日〕島田謹二：〈臺灣の文學的過現未〉，《文藝臺灣》2：2 (1941.5)，頁 2-24。
- 〔日〕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台湾に於ける文学について〉，《愛書》14 (1941.5)，頁 3-24。
- 〔日〕橋本恭子：《「華麗島文学志」とその時代：比較文学者島田謹二の台湾体験》，東京：三元社，2012。
- Hutcheon, Linda. "Interventionist Literary Histories: Nostalgic, Pragmatic, or Utopia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A Journal of Literary History* 59.4 (Dec. 1998), pp. 401-417.
- Jauss, Hans Robert and Elizabeth Benzinger.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2.1. A Symposium on Literary History (Autumn, 1970), pp. 7-37.

Perkins, David.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Fang Ming, *Tai Wan Xin Wen Xue Shi* [A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ese Literature]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 Chen Shao Ting, *Tai Wan Xin Wen Xue Yun Dong Jian Shi* [A Brief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ry Movements]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 Chen Tsui Lien, “The Historical Rectification in Postwar Taiwan (1945-1947)” in *Historical Inquiry* 57 (Dec. 2016), pp. 195-248.
- Hsiao A Chin, “‘Indigenization’ (bentuhua)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Strategic Essentialism and State Power” in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Sep. 2005), pp. 97-129.
- Lin Nikky, “‘Taiwan’ Literature: The Appropriation and Adaptation of Hippolyte Taine’s Theory and Its Meanings in Taiwan Literary Criticism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in *Humanitas Taiwanica* 83 (Dec. 2015), pp. 1-35.
- Lin Nikky, “Constructing a Colonial Literary History: Re-Examining the Writing of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y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23:4 (Dec. 2016), pp. 81-122.
- Pasuya Poiconu, *Tai Wan Yuan Zhu Min Zhu Wen Xue Shi Gang*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Taipei: Liren Bookstores, 2009).
- Taiwan Shin Sheng Daily News’s Editorial Committee, *Tai Wan Nian Jian* [Taiwan Almanac] (Taipei: Taiwan Shin Sheng Daily News, 1947).
- Wang Shi Lang, “Taiwan New Literature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in *Taiwan Literature* 3 (Jun. 1964), pp. 49-58.
- Yeh Shih Tao, *Tai Wan Wen Xue Shi Gang* [A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Kaohsiung: Chun-Hui Publish, 1987).